

# 阐释学视角下《大学》理雅各译本 厚重翻译策略分析

侯方园

(商丘学院 外国语学院, 河南 商丘 476000)

[摘要] 文章从斯坦纳阐释运动理论出发,采用定性分析及案例分析的研究方法,分析《大学》理雅各译本中厚重翻译策略的应用。文章以斯坦纳阐释翻译观所描述的四个翻译步骤为依据,对《大学》理雅各译本中厚重翻译策略的类型进行归纳,并对厚重翻译策略在“信任”“侵入”“吸收”及“补偿”四个翻译步骤的具体体现进行分析,进而论证厚重翻译不仅是一个阐释文化意向的翻译工具,更是一种贯穿整个典籍翻译过程的翻译策略。

[关键词] 阐释学;《大学》;理雅各;厚重翻译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19)02-0122-07

## 一、引言

《大学》是一篇论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儒家典籍,原为《礼记》的第四十二篇,后经北宋程颢、程颐以及南宋朱熹的推崇,与《中庸》《论语》《孟子》并称“四书”,位于四书之首。《大学》蕴含着丰富的修身、治人哲学,对中国政治、文化、社会伦理等各个方面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

由于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在翻译过程中,典籍文学往往很难在目的语中找出与源语对应的表达,由此造成含义不明、意义缺失等问题。因而,在典籍英译过程中,原文意义的精准传达尤为重要。为精准地传递原文的意义,译者常借助注释、评论等厚重翻译策略对文本的意义进行阐释,挖掘文本背后蕴含的深层含义,以期更精准地传达原文的思想,促进目标读者对原文以及源语文化的理解。

在《大学》的各个英译本中,最为经典的版本当数英国著名汉学家理雅各的译本 *The Great Learning*,本译本收录于理雅各翻译作品《中国经典》第一卷。在《中国经典》开篇中,理雅各即引用《孟子·万章上》中的一句话:“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

意逆志,是为得之。”<sup>[1](286)</sup>以彰显译者不拘泥于字词、词句,而旨在传达原作者原意以及原文含义的翻译意图。理雅各为首位完整翻译《四书》《五经》的传道士兼汉学家,同时也为牛津大学首位汉学教授,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较为深刻的理解。理雅各《大学》译本以《四书章句集注》之《大学章句》为底本,借助绪论、注释、评论及索引等厚重翻译策略对原文文化色彩较为浓厚的词句进行处理,并对《大学》原文以及《大学》背后所蕴含的文化、政治、社会因素进行了深度剖析,最终将《大学》所表达的意义精准完整地呈现在目标读者面前,整个翻译过程均充满了浓厚的厚重翻译色彩。

鉴于此,本文拟以斯坦纳的阐释学翻译理论为理论指导,从“信任”“侵入”“吸收”及“补偿”四个阐释学翻译步骤出发,对理雅各英译《大学》过程中所采用的厚重翻译策略进行分析,探讨厚重翻译策略在《大学》理雅各译本的具体应用。

## 二、阐释学翻译理论

### (一) 阐释学理论概述

阐释学是指针对文本意义的理解和解释的理论或哲学,是对意义和理解行为的研究,关注焦点在于意义。这一特点与厚重翻译策略之“补充说明

[收稿日期] 2018-10-20

[作者简介] 侯方园(1989-),女,河南安阳人,助教,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译文中所缺失的原文意义”的功能较为吻合,两者均侧重于意义的传递。

阐释学起源于古希腊罗马时期,19世纪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经历了以译经学为代表的古典阐释学、以施莱尔马赫与狄尔泰为代表的浪漫主义阐释学、以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为代表的哲学阐释学,以及以贝蒂与利科为代表的后现代阐释学。阐释学在翻译理论领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其中,施莱尔马赫阐释了翻译与理解的关系,并提出了两种翻译途径:“1.不打扰原作者,让读者接近原作者;2.不打扰读者,让原作者接近读者。”<sup>[2]</sup>海德格尔区分了“翻译”与“转渡”间的关系,将解释与翻译等同起来,为翻译研究开拓了新的空间。

然而,影响较大的阐释学著作当属斯坦纳的代表作《通天塔之后》(After Babel)。在本书中,斯坦纳独立开辟一章,系统地对“阐释运动”进行阐述,并提出翻译活动的四个著名步骤。

### (二)斯坦纳阐释运动

1975年,翻译理论家乔治·斯坦纳出版了《通天塔之后》一书,本书一经问世即广受关注,被誉为里程碑式的著作。斯坦纳宣称,该书自18世纪以来首次对翻译的理论和过程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在“阐释运动”一章中,斯坦纳专门提出并详细论述阐释学翻译理论模式,将阐释学方法定义为“考察‘理解’一篇口头或书面语言意味着什么,并试图以意义的普遍模式解释这一过程”<sup>[3](249)]</sup>。另外,斯坦纳还探讨了影响翻译过程中意义产生的过程和理解的过程,把翻译看作是“发出意义并对意义进行挪用性转移的行为”<sup>[3](312)]</sup>,强调了意义传达在翻译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在“阐释运动”章节,斯坦纳将翻译过程划分为“信任”(trust)“侵入”(aggression)“吸纳”(incorporation)与“补偿”(enactment of reciprocity)四个阶段。其中,第一步是指“起初时的信任”,相信原文中有某种“存在意义”;第二步为“侵入”,译者闯入原文,抓住意义;第三步为“吸纳”,把原文中的意义吸收进译文;第四步为补偿,即恢复平衡,使译文得到强化。斯坦纳坚信,该诠释过程突破了传统的直译、意译和拟作之间的界限,使话语能够通过理解和阐释来发挥它的指涉作用。由此可见,从一开始的“相信文本中有某种‘存在意义’”到最后的“恢复平衡,强化译文意义”,整个翻译过程均侧重于文本意义从原文到译文的传达。因此,斯坦纳的四个翻译步骤实质上也是一个传达文本意义的翻译过

程。这一理论为译者提供了一个新的诠释视角,即在翻译过程中应注意文本意义的精准传达。

## 三、厚重翻译策略研究

### (一)厚重翻译理论概述

“厚重翻译”(Thick Translation)是文化翻译(特别是典籍翻译)中的一种常见翻译策略,且该策略由来已久。然而,厚重翻译作为专业术语的提出可追溯至美国学者阿皮亚(Appiah)于1993年发表的《厚重翻译》一文。阿皮亚在“厚重描写”(thick description)的基础上提出了“厚重翻译”这一概念,认为厚重翻译就是“通过注释、评注等方法将文本置于丰富的文化与语言环境中”<sup>[4](427)]</sup>,从而呈现源语文本发生的语境,使被文字遮蔽的意义与译者的意图互相融合。2003年,英国学者赫曼斯(Theo Hermans)将厚重翻译概念引入翻译研究领域,认为“厚重翻译作为跨文化翻译研究的工具,可以避免翻译研究中术语的枯燥乏味性以及格式表现上的缩减性,并可促进产生更加丰富多彩的多元化词汇”<sup>[5]</sup>。另外,Shuttleworth等认为,无论是以脚注、词表还是长篇序言的形式出现,任何包括大量此类解释性材料的目标文本都适用于厚重翻译这一术语<sup>[6]</sup>。因而,厚重翻译策略在形式上可具体化为脚注、尾注、夹注、双行小注、文内引注,以及序、跋、献词、后记、附录、术语表、致谢等类型,具体特点可表现为以注释、术语表或引言等形式在翻译中加入大量解释性的内容,从而为目标读者理解原文提供丰富的背景信息,将翻译文本置于一个丰富的语境之中,体现出对他者文化的宽容与尊重。

### (二)《大学》理雅各译本中的厚重翻译策略

《大学》理雅各译本蕴含着大量原文文本之外的阐释性信息,是厚重翻译策略应用的典型译本。《大学》理雅各译本收录于理雅各经典译作《中国经典》第一卷内,译作内容包括前言、绪论、正文、索引四大部分。其中,绪论、正文及索引部分分别对《论语》《大学》《中庸》所涉及的相关文化信息进行了概述。前言、绪论及索引等阐释性文本所占篇幅较大,大概占据全文五分之二的内容。此外,译文正文部分也包含着大量的阐释性文本,厚重翻译策略色彩较为浓厚。根据译作的内容,可将厚重翻译策略划分为正文外厚重翻译策略和正文内厚重翻译策略两大部分。

#### 1. 正文外厚重翻译策略

《大学》是儒家学派的代表作,文中蕴含大量的儒家思想。然而,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西

方读者较难理解《大学》文本所蕴含的浓厚儒家哲思。为了让目标读者对源语文化有进一步的认识,理雅各在正文文本之外花费大量篇幅介绍中国文化、儒家哲思、文化典籍、人物术语等内容,从而使目的读者尽可能的接近源语文化,进而对文本内容形成一个较为深入的理解。总体而言,正文外厚重翻译策略可具体体现在前言、绪论和索引三部分。

前言部分主要介绍译者的译介背景、出版赞助人、译作的期望受众、译作内容、所参考的音译系统以及译作不足之处等内容,概述了译者翻译活动的具体背景。

绪论部分可细分为中国经典总论、各译作分论、孔子及其弟子概述以及主要参考作品列表。中国经典总论对中国的书、经典籍进行介绍,并对典籍的历史背景进行了概述,促使作者更好地了解译文的文化背景;《大学》绪论部分描述了文本的历史演变过程以及先贤对《大学》文本的注疏,考据了《大学》的原作者以及经传之间的区别,论述了《大学》的内容与价值以及译者本人对原文文本的理解;孔子及其弟子概述绪论部分简述了孔子的家族、生平、影响力以及弟子简述等相关信息;主要参考作品列表绪论部分列举了一些重要的中国文学典籍以及相关典籍的英译本。

索引部分罗列了文本中所涉及的术语及人物信息。

正文外厚重翻译对译者的翻译背景、译本的历史文化背景、译文术语及名词意义进行了详尽的描述,为目标读者阅读文本奠定了深厚的文化背景基础,消除了目标读者阅读异域译本时的艰涩感,有利于目标读者更好地理解译文所涵盖的文化内涵。此外,在正本文本之内,译者同样应用了大量的厚重翻译策略。

## 2. 正文内厚重翻译策略

理雅各《大学》译本正文中添加了大量的阐释性信息,有注有评,内容丰富。该译本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之《大学章句》为底本,朱熹版《大学》对《礼记·大学》进行了整编,变更了原文的句间顺序,并增加了一些过渡文段,理雅各在译本中沿袭了朱熹对《大学》所做出的变更。在理雅各译本的正文中,原文、译文、注释按上、中、下三层排序,结构较为清晰。原文最上,从右至左竖行排列,按照朱熹《大学章句》段落划分小结,并以数字标注章节序号。译文居中,同用数字标号,与原文对应;朱熹所作过渡性句段译文以斜体标识,其他原版译文以正体标识。注释最下,字号最小。注释类厚重翻译

文本内容较为丰富,约占据整个正文二分之一以上的篇幅,可具体划分为字词考证、句义阐释以及批判性注释等类型。

### (1) 字词考证

在翻译实践中,由于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原文中一些文化色彩较为浓郁的字词很难在目的语文化中找到对应的表达;或者,文化负载词能够在目的语中找到接近的对应表达,然而目的语中的相应表达却并不能够完全表达原文字词的全部含义,从而造成部分意义缺失。作为一部古典文化典籍,《大学》蕴含了大量的文化负载词,翻译过程中该类词汇的意义传达难度较大。然而,在《大学》理雅各译本中,译者在处理中国文化色彩较为浓郁的字词时,并未仅仅停留在译文层面对原文文本的意义进行阐释,而是从原文文本本身出发,在字词层面对目标语文化受众较难理解的词汇进行解释,从析字、训诂的角度在词音、词义上对字词进行分析,使目标读者直接接触文本字词在原文文化中的含义,从而更精准全面地理解原文文本的意蕴,避免翻译过程中意义缺失等问题。

例如,在对“正其心”“诚其意”中的“心”和“意”进行注释时,理雅各即从训诂和析字的角度出发,参考朱熹和孔颖达的注疏对“心”“意”两词进行了阐释。在注释文本中,理雅各对“心”“意”的阐释如下:

Choo He defines 心 as 身之所主, 'what the body has for its lord,' and 意 as 心之所发, 'what the 心 sends forth.' Ying-ta says: 总包万虑谓之 心, 'that which comprehends and embraces all considering is called the 心'; 为情所意念谓之意, 'the thoughts under emotion are what is called 意.'<sup>[7](222)</sup>

由上所述,译者在译文注释中通过析字、训诂等方法,对文化负载词的原意进行剖析,更精准全面地传达字词在原文的含义,将文本置于更为丰富的语境之中,加深目标读者对原文文化的理解。考证字词的厚重翻译策略不仅能使译文读者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更深的理解,还能够避免文本字词在翻译过程中发生词义缺失的现象。

### (2) 句义阐释

作为厚重翻译策略的工具,注释主要用于阐释文本的内在含义,辅助目标读者对文本所蕴含的文化背景及背后意义形成一个深入的理解。《大学》是一部历史悠久的文化典籍,文中蕴含着大量古人修身治人的哲学思想以及许多取材于其他古籍且

寓意深刻的文化典故。初读《大学》之时,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人仍需实下一番功夫才能够完全参透其中的含义,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英语受众要想完全领悟《大学》中所蕴含的全部意义更是难上加难。故而,理雅各在译本中加了大量的注释,对文本所蕴含的意义进行阐释,以辅助目标读者对文本形成一个较为精准的理解。在正文文本中,每页注释可占全文页面的三分之一以上,不但对文本本身的含义进行了解释,还对文本背后的文化社会背景进行了介绍,为读者阅读文本创造了一个更为全面、立体的文化语境。

理雅各《大学》译本主要以朱熹《大学章句》为底本,所著译文基本与朱熹对《大学》的解读相一致。然而,为了精准、全面地传达原文文本所蕴含的意义,理雅各在译本注释中还考据了南北朝学者孔颖达以及北宋学者程颢、程颐对《大学》的注疏,对原文文本做出了更为全面的解读。以《大学》正文首句“大学之道,在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译文的注释为例,译者首先通过分析汉字对整个文段的字面意思进行了概述,然后对“明德”等文化负载词的文化背景进行了剖析,最后考据了程颐、朱熹、孔颖达等学者对这一纲领句的理解,全方位的对这一纲领句的句义进行了阐释。借助丰富的注释内容,目标读者能够更为全面、精准地接收译本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与哲思,进而对译本蕴含丰富文化意向的语句有一个更为深入的理解。

### (3) 批判性注释

批判性注释是译者批判性思维的反映,是译者自己对译文的理解。批判性注释旨在对原文中心观点的合理性提出批判和质疑<sup>[8]</sup>。在翻译实践中,译者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自身所处环境、所受教育以及所经历的影响,进而对原文文本以及译文文本有自身独特的理解,而这一特点不可避免地会在注释中有所体现。在对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的理解上,理雅各在注释中对朱熹《大学章句》中“此三者,大学之纲领也”的观点进行了批判,指出《大学》的纲领不在“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三者,而在“明德”“新民”两者,而“止于至善”所表达的只是对“明德”“新民”两者的不懈坚持。

另外,在翻译《大学》之际,理雅各的本职工作为传教士,他翻译儒家经典是为了学习中国语言,了解中国人的思想文化根基和民族特色,从而更好地认识中华民族的民族特色,以方便自己的传教事业。因此,受其传道士职务的影响,理雅各在注释中对文本做出了与其传教士意识形态相符合的批

判性评论。例如:在“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一句的译本中,理雅各做出了充满主观色彩的批判性注释,认为《大学》应该是皇室读本,而不适合作为教育普通人或蒙童的读物。此类注释往往会受到译者自身文化背景以及个人阐释倾向的影响,具备较强的个人主观性。

## 四、斯坦纳阐释运动视角下 理雅各《大学》英译过程中 厚重翻译策略的应用

翻译理论家乔治·斯坦纳在其1975年出版的著作《通天塔之后》中,对“阐释运动(Hermeneutic Motion)”做出了详尽的描述,将翻译看作是“发出意义并对意义进行挪用性转移的行为”<sup>[3](312)</sup>。斯坦纳认为翻译实践是一个发出意义、传达意义的过程,并将该过程划分为“信任”“侵入”“吸收”以及“补偿”四个阶段。此外,厚重翻译策略旨在通过添加注释等厚重翻译工具挖掘文本背后所蕴含的深层意义,弥补翻译过程中所造成的意义缺失现象,促进读者对文本意义形成更为深刻的理解。因而,斯坦纳阐释运动与厚重翻译之间存在着共同之处:两者均侧重于意义的传达。基于此,本章节拟从斯坦纳阐释运动的理论视角出发,探讨厚重翻译策略在理雅各英译《大学》过程中“信任”“侵入”“吸收”及“补偿”四个翻译阶段的具体应用。

### (一) 信任阶段

根据斯坦纳的阐释学翻译理论,起初时的“信任”为翻译阐释过程的第一步。译者在开始翻译之际,便要投入“信任”,相信原文中有可以理解的东西。就理雅各而言,作为传教士,其翻译儒家经典的目的在于了解中国人的思想文化根基和民族特色,以方便自己在中国的传教工作。因而,译者必然相信《大学》中存在可以为英语读者所理解的中国文化内涵,这一点在“前言”以及“绪论”这两种正文外厚重翻译策略中均有所体现。在“前言”部分,理雅各就明确指出“希望译作能够服务于传教士以及其他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表明了其为传教事业而意欲了解中国文化思想的意图;而在“绪论”部分,理雅各针对对中国影响力最大的儒家哲思做出了系统的历史文化背景介绍,也验证了译者相信原文文本中具备可传达至英语读者且为英文读者所理解的文化内涵。

就翻译而言,初期信任即“译者认为原文代表了现实世界中的某个东西,一种连贯的‘东西’,可以翻译,即使其意义并非一眼看上去即可明

白”<sup>[9](234)</sup>。然而,这种观点本身也存在风险,原文所代表的“某个东西”可能是“一切”东西,几乎任何东西都可能有无穷的指涉意义。以《大学》中汉字“道”的英译为例,汉字“道”是中国文化中一个较为重要的哲学名词,其最初意义是道路,后来引申为“做事的途径”“方法”“本源”“本体”“规律”“原理”“境界”“终极真理”和“原则”等含义,而“道”在《大学》理雅各译本中的处理主要有“way”“method”“principle”等常见表达,但显然每种译本均只能够传达“道”的某种指涉意义,而不能够完全表达涵盖“道”所蕴含的所有含义。为应对上述困境,理雅各在注释中从析字的角度分别对“道”在不同语境下的含义做出了阐释,阐明了“道”在不同语境之间的不同用法,进而消除了翻译过程中文化负载词所面临的意义缺失等风险。

## (二)侵入阶段

译者的第二个行动是侵入,即侵入阵地,将意义掠夺过来,就如圣哲罗姆(Hieronymus)的比喻一样:译者把意义像囚犯般抓过来。斯坦纳对这一步骤做出了形象的描述:“就像是在露天矿区,译者进攻、掠夺,然后将东西带回家中。地表留下一处巨大的疤痕。”<sup>[3](314)</sup>然而,在完成具体的翻译实践之后,译者可能会发现文本在本职上会出现转变:外语的文本变“薄”了,如稀疏的纤维,光纤可以透过<sup>[2]</sup>。另外,Hatim认为文本作为信息或者故事的提供者有三个特征:(1)所有的文本意义都具有多重性;(2)一次只有其中的一部分意义能够被显示出来;(3)文本也有可能具有并未实际表现出来的意义<sup>[10](76)</sup>。因此,虽然译者将原文文本的意义掠夺过来,并以译文文本的形式对上述意义进行了再现;然而,与原文文本所蕴含的信息相比,译文文本所呈现的意义总是会有所欠缺,这就是上文所说的“外语的文本变‘薄’了”。而加注等厚重翻译策略恰好能够弥补文本“变薄”这一缺陷。

厚重翻译策略旨在通过注释、评注等方法将文本置于丰富的文化与语言环境中,借以呈现源语文本发生的语境,进而使被文字遮蔽的意义与译者的意图相融合。这一宗旨能够弥补文本“变薄”而导致的语意缺失。在“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一句的英译中,理雅各将“天子”译为“emperor”,即“帝王”。从词义分析,“天子”是封建社会臣民对社会最高统治者的统称,从这一层意义理解,将“天子”处理为“emperor”的译法并无不妥。然而,“天子”还具备“其命源天”的含义:古代封建社会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以及维护自己的

正统地位,声称其权利出于神授,秉承天意治理天下,故可称为天子。因此,仅仅将“天子”译为“帝王”,并不能够完全呈现出天子“其命源天”的中国文化内涵。在正文内注释部分,译者对天子“其命源天”的意义进行了注释,指出天子即“Son of Heaven”以及其“以其命于天”的文化内涵,从而对译文中所缺失的文化意义进行了补充说明。因而,在侵入阶段采用厚重翻译策略往往可弥补意义摄取过程中文化意涵缺失的风险。

## (三)吸收阶段

阐释运动的第三步为吸收,即译者把原文意义融入译文的方式。意义在译文中的吸收同化会有不同的类型:斯坦纳把两种极端中的一种视为“完全的归化”,即译文在目标语经典中取得完全的地位;另外一种“长期的陌生性和边缘性”,该译文采取直译的方法,脚注比正文还长。<sup>[9](234-235)</sup>理雅各译《大学》显然属于第二种类型,译者采用直译的译法,译文结构与原文结构相符,且添加比正文内容更为丰富的注释。

由于文本中涉及大量文化色彩较为浓厚的词汇,且重新表达该类词汇的过程十分艰苦,译者很难在目的语中找到可以接受的对应词。因而,在对这类词汇进行处理时,译者采用了大量的异化翻译技巧,并在注释中对原文文本的文化负载词做出了详尽的诠释。以理雅各对“蓄马乘”“伐冰之家”“百乘之家”等蕴含浓厚中国文化色彩的处理为例,在中国文化典故中,“蓄马乘”“伐冰之家”“百乘之家”的寓意并非仅仅为其字面意思所指涉的“拥有一车四马的人家”“办丧事时能够用冰来保存尸体的人家”“家中有一百辆车的人家”,所指涉的是字面含义背后所蕴含的象征意义。在古代中国,“拥有一车四马”是大夫级的官员能够享受到的待遇,“办丧事时能够用冰来保存尸体”是卿大夫以上的大官能够享受的待遇,而“家中有一百辆车”通常是有封地的诸侯王才能够享受的待遇。因而,“蓄马乘”“伐冰之家”“百乘之家”的指涉含义应该是“大夫”“卿大夫以上的大官”以及“有封地的诸侯王”。在理雅各的译本中,译者在译文正文中将三者直译为“He who keeps horses and a carriage”“The family which keeps its stores of ice”“The house which possesses a hundred chariots”,从形式上实现与原文的对等,并在注释中对三者的象征指涉意义进行详尽的描述,达到意义层面的对等。因而,阐释性注释能够对正文文本进行阐释说明,两者互相补充,从而将原文文本的字面意思及指涉意义完全地

呈现出来。

#### (四)补偿阶段

补偿是阐释运动的最后一个阶段,如果缺失这一环节,便是危险且不完全的。上述三阶段对原文意义的进攻性挪用和吸收会在原文中留下一个辩证性的残余,从而造成原文和译文之间的失衡。例如:译者取去的可能太多,对原文进行了增补,并加入个人意见;也可能取去的太少,对原文进行了删减,并删掉不顺畅的内容。这些不当译法均会破坏整个系统的和谐。既然存在破坏,就必然需要对破坏进行补偿。译者应尽其所能地恢复各股力量之间的均衡,以维持作品在理解过程中被掠夺、破坏了的完整性,确保译文能够完整、准确地传达原文所蕴含的意义。对于原文文化与译文文化差异较大的翻译实践而言,补偿所发挥的作用更加明显。通过合理的补偿,目的语文本的内容与形式能够实现平衡,文化差异能够得到调适,从而有利于译本在目的语环境中获得承认和接纳。

阐释理论家施莱尔马赫认为,译者给出的比原作者给出的要多。在《大学》译本中,理雅各给出的内容就要比原作者多,注释等阐释性文本几乎占据正文的三分之一以上,并且加入了个人意见,添加了评判性注释。例如:在对“致知”“格物”进行阐释时,理雅各即在注释中加入自己的意见,认为朱熹对“格物”“致知”之“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的阐释是“不准确的”或“不可能实现的”。显然,译者在译本中加入了个人意见,属于“译者取的太多”的范畴,破坏了系统的平衡性。不过,译者随即在注释中对此做出了补偿,在个人意见之后加入了孔颖达及罗仲潘对“格物”“致知”的注疏,阐明了两者的对“格物”“致知”的理解,以考据文献的方法丰富“格物”“致知”的文化语境,有助于读者根据自身的判断对“格物”“致知”形成一个客观的理解。另外,索引部分对文本中所涉及的术语及人物信息进行阐释,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对译文文本进行补偿。因此,注释、索引等厚重翻译策略的应用能够对原文文本与译文文本之间的失衡状态进行补偿,加深目的读者对文本的精准理解。

由此可见,在从“信任”到“补偿”四个阐释翻译步骤中,厚重翻译这一翻译策略均有所体现。厚重翻译并不仅仅是一种阐释文本的翻译工具,更是一项贯穿整个翻译实践的翻译策略,对译者精准、全面地呈现原文文本所涵盖的意义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 五、结 语

对于《大学》这种蕴含着丰富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文学典籍的英译而言,很多富含传统文化意向的文本内容很难在目的语中找到对应的表达,文本背后所蕴含的厚重含义很难在目的语中得到精准的传达,往往需要借助加注等翻译策略呈现文本所指涉的全部文化意蕴。厚重翻译的目的在于通过注释、评论的方式将文本置于更为丰富的语境之下,以深入挖掘被文字遮蔽的意义。与此同时,阐释学同样侧重于对文本意义的理解和解释,阐释学集大成者斯坦纳更是认为翻译是“发出意义并对意义进行挪用性转移的行为”<sup>[3](312)</sup>。由此可见,厚重翻译与阐释学二者均注重翻译过程中“意义”的传达,与典籍翻译需注重“意义的精准传达”这一理念相符合。本文以斯坦纳的阐释学翻译理论为视角,探讨并分析了厚重翻译策略在《大学》理雅各译本中的应用,将厚重翻译策略划分为正文外厚重翻译以及正文内厚重翻译两类,并对厚重翻译策略在斯坦纳阐释学各个翻译步骤中的实际运用进行了剖析,从而阐明厚重翻译并不仅仅是典籍英译中的一个简单的翻译技巧,而是贯穿于整个翻译过程的一种实效性极强的翻译策略,在典籍外译以及文化意向传达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 [参 考 文 献]

- [1]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M]. 北京:中华书局,2016:286.
- [2] 西风. 阐释学翻译观在中国的阐释[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9(3):56—60.
- [3] STEINER G. 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 [4] ANTHONY A K. “Thick Translation” in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M]. L. Venuti. (ed.).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 [5] THEO H. Cross-cultural translation studies as thick translation [J].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2003(66):380—389.
- [6] MARK S, MOIRA C.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Z].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 [7] LEGGE J. The chinese classics: with a translation,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notes, prolegomena, and copious indexes. Vol. I: confucian analects, the great learning and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M]. Hong Kong: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s Printing Office, 1861.
- [8] 周领顺,强卉.“厚译”究竟有多厚?——西方翻译理论

批评与反思之一[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6(6):103—112.

[9] JEREMY MUNDAY. 翻译学导论:理论与应用[M]. 李德凤,译.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

[10] BASIL H. 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translation[M].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责任编辑:蒋萍)

## **An Analysis of the Thick Translation Strategy adopted in the English Version of *The Great Learning* by James Leg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ermeneutics**

HOU Fang-yu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gqiu University, Shangqiu Henan, 476000)

**Abstrac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thick translation strategy adopted in the English version of *The Great Learning* by respectively taking qualitative analysis as the research method and Steiner's hermeneutic motion theory as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On the basis of Steiner's four hermeneutic translation procedures, the paper summarizes the types of thick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dopted in *The Great Learning* by James Legge and discusses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of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t the stages of trust, aggression, incorporation and enactment of reciprocity, further demonstrating that thick translation is a translation strategy applied through the whole process of Chinese classics translation rather than merely a translation tool of interpreting cultural implications.

**Key words:** hermeneutics; *The Great Learning*; James Legge; thick translation